



当代浙学文库
DANGDAI ZHEXUE WENKU

『乌有』之义

——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

周黎燕 著

WU YOU ZHI YI
MINGGUO SHIQI DE WUTUOBANG XIANGXIANG

本书通过爬梳和归纳民国时期有关乌托邦思想特质文学现象，探索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类型，进入民国时小说文本后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及其想象方式的差异性和杂性，以期从文学的角度切入乌托邦功能和意义的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乌有』之义

——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

周黎燕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周黎燕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308-09590-7

I. ①乌… II. ①周… III.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432 号

“乌有”之义：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

周黎燕 著

责任编辑 胡 晔

封面设计 北京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2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590-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1516年当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出版后，一个臆造而成且充满想象的新词如幽灵一样开始在欧洲流传，并招来了各种各样的首肯或批判。但无论人们怎样对待它，肯定也好，否定也罢，它都以自己的存在顽强地向各个领域渗透，并逐步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通行语，同时，它也以自己不可遏制的魅力向文学渗透，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文学的一种类型，这就是 Utopia(乌托邦)，以它为意念所构造的文学就是乌托邦文学。

20世纪初，当严复通过翻译亚丹·斯密的《原富》将这一词语以概念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后，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意，并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文化与革命先驱的重视，唤起了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些深受传统“大同”思想影响人士的青睐，并由此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成为了先驱们构想未来中国社会情景与文化景观的理性依托及思想资源，也成为了像梁启超一样的文人们文学创作的审美想象依据。但，也许是汉语“乌有”的提示作用，也许是释义过程中理解的偏颇，也许是“词义在跨语际旅行中产生巨大的变异”的关系，也许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苦难历史与现实实在无法容纳它虚构的“黄金世界”的客观原因，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构的过程中，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随着现实给予人们的屈辱感、忧郁感以及与此伴生的不平、不满、愤懑、怨恨情绪的不断积累，乌托邦所寄寓的虚幻的“黄金世界”逐渐被否定的声浪所淹没，也被以鲁迅为代表的睿智的思想家和关注现实、关注人的解放的文学

家所拒绝。鲁迅曾在《野草·影的告别》中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明确地表达了对乌托邦的否定与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对乌托邦的否定不仅是学术性的，也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而是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指斥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言论及行为的代名词，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价值立场的心理定势。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之中，以乌托邦为角度的文学研究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局面。进入我们习惯地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这样的局面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人们固然不再如之前一样谈乌托邦即色变了，但否定性的思维及谨慎的态度仍是一种主导性的集体无意识，虚幻仍是人们对那些具有乌托邦特征的文学作品的美学与历史意义的基本界定，局部的研究和个体性的批评是其主要的格局。但，关于乌托邦与文学，关于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毕竟破冰而扬帆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之下，本书的作者周黎燕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工作。

2004年，周黎燕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又颇具慧心，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投注了大量精力，而且广泛地阅读了中外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心理学、文艺学等方面的著作，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2005年5月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当她将一份博士论文构想的提纲交给我，在一瞥之间，我没有记住论文构想的题目是什么，但却被“乌托邦”三个字吸引住了，因为，在我的意识中，乌托邦不说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对象，也起码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研究对象。于是，我也不管她还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拿起提纲仔细地阅读起来。一气读完，我陷入了沉思，我固然佩服她的勇气与智慧，但更多的是一种担心。我的担心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乌托邦这样一个仍然存在争议的概念之下展开研究，是否能如愿呢？其

次,乌托邦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种文类,有较为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也形成了相应的艺术规范和理论的自觉,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审美形式,是在西方文化环境,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实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虽然也孕育出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之类的作品,但并没有文类的自觉,也当然没有完整的、关于乌托邦文学的理论表述。进入现代,中国文坛也没有这一文类的理论表述。也就是说,如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包括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乌托邦文学,就只能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而在借用的过程中,中国学界每每表现出的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硬性框套的弊病,又不能不让我警惕。其三,即使按照乌托邦文学的规范,将她所认可的中国近代、现代的文学现象纳入其中,是否就能解读出新的意蕴、新的规范、新的景观呢?

我虽然担心,但也不好断然否定她的选题,因为我毕竟在这些方面还没有系统地涉猎,更没有整体和深入的思考。于是,我告诉她,是否能列出一个更为详尽的提纲给我。她答应了,我们预定了下次再交换意见的时间。她走以后,我为了更好地履行我的职责,也找了一堆有关乌托邦与文学的资料来看,经过一番自我陶冶,对乌托邦及其与文学的问题也有了一些了解。大约一个月后,周黎燕将一份近两万字的详尽提纲交给了我,提纲论证较为充分,问题意识十分明确,我读完后终于首肯了她论文的选题,并引发了一个联想,我想,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所借鉴的是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既然他们能在非科学的理论中发现合理的内核并创造出科学的系统理论,那么这也说明即使是非科学的理论也能成为创新的资源,更何况是有争议的理论(如乌托邦)呢?又更何况是关于乌托邦文学的问题呢?

暑来寒往,当进入 2006 年冬天的时候,周黎燕完成了她论文的初稿,后来又经过几次修改、充实、推敲,到 2007 年 4 月终于定稿,同年 6 月,她提交了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而我先前所担心的

三个问题,在她的论文中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就乌托邦的所指及其历史来看,论文不仅进行了语义学的辨析,更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与考察,既考察了其本体的意义,也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其指向未来又针对现实的价值追求,既分析了乌托邦本身所具有的“世俗化”倾向及积极意义,也分析了其消极的作用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既注意了西方乌托邦的理论资源,也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想中的乌托邦意识,从而为自己论文的展开打下了一个很稳妥的基础。就对乌托邦文学的规范、特点、意义的分析来看,论文较好地將中西乌托邦文学的传统进行了比较与辨析,对西方乌托邦文学理论的借鉴并没有生吞活剥,更没有削足适履地简单框套,而是侧重从艺术精神的层面和价值追求的层面借用其相关的理论资源展开自己的论述,显得较为得心应手。而我最为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即创新的问题,在论文中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语境中的政治乌托邦文学、现代语境中的乡土乌托邦文学和革命乌托邦文学的论述,所涉及的对象分别是近代“新小说”、科幻小说,现代京派小说和左翼小说,这些对象并不是到现在才引人关注,而是早已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且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论文要创新,的确很有难度,但难度与机遇又是相联系的,当难度一旦被突破,也就成为了机遇。

论文的突破就在于以思想史的理论资源为先导,搜集、辨析、比照大量相关现代文学、史学资料,在此基础上,考察乌托邦想象的文学史意义。理论佐证与史料考辨为文学研究奠定扎实而严谨的学理基础,避免了文本研究“症候式”解读的空泛与单薄。而以史为证,论从史出,思、史、文三者的交融汇合保证了研究的朴实与稳固。如此,关于乌托邦在中国近现代小说书写的考察不再是为了单纯展现乌托邦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表征,也不是仅仅为了观照文学想象而寻找一种理论武器,而在于考察乌托邦在民国史的背景下,其具象表现以及与现代文学史之建构发生关系的

方式和途径,解读乌托邦如何冲击与改变现代文学的文学理念、审美原则、艺术精神和表现形式,显示其吸纳与宣扬乌托邦思想特质的文学想象的丰富性与独异性,从而力图为“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一份借鉴与启示。

后来,她又对论文进行了一定的充实和修改,其中,加入了一些内容,如第四章第一节中关于夏衍《上海屋檐下》的论述,第三节关于叶紫《星》的论述等。这些内容的加入在我看来虽然不足以提升关于中国近代、现代乌托邦文学书写的研究境界,却也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增加了相应的材料,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还是值得称道的。现在这本在原来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的书稿就要出版了,我想这既可以看作是周黎燕“在路上”的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也是其学术追求的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衷心希望她收获更多的成果。

许祖华

2011年9月29日于武汉

目 录

CONTENTS

序

绪 论

第一章 从乌托邦到乌托邦文学

第一节 乌托邦与人的存在	10
一、何谓乌托邦?	10
1. 概念的厘定	10
2. 乌托邦与人的存在	18
二、中西乌托邦的文化特征	23
1. “世俗化”: 中西乌托邦的共性特征	24
2. “乡”与“城”: 中西乌托邦社会形态之比较	30
第二节 作为文学想象形式的乌托邦	36
一、乌托邦: 文学想象的另类方式	37
二、作为中国文学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43
1. 中国乌托邦文学之确立	43
2. 现代文学乌托邦之呈现	46

第二章 近代语境中的政治乌托邦

第一节 从传统到近代	54
一、近代化与大同理想	54
二、康有为大同乌托邦的现代意义	57
第二节 “新小说”的政治乌托邦想象	66
一、“新中国”：“新小说”创造的民族国家神话	68
二、回到“未来”：晚清乌托邦的时间观	75
第三节 晚清科幻乌托邦的前现代性	82
一、科学与乌托邦	83
二、晚清科幻乌托邦的前现代性	86

第三章 现代语境中的乡土乌托邦

第一节 京派小说的乡土想象	95
一、乡土：京派小说的精神家园	95
二、边缘：乌托邦写作者的身份意识	102
第二节 从建构到解构	114
一、“异质”的“现代”：沈从文“边城”乌托邦解读	115
二、纷扰的“传统”：废名“桃园”乌托邦解构探析	126
第三节 中国形象：老舍《猫城记》的反乌托邦书写	135
一、现代想象之“中国”	135
二、猫国：反乌托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137

第四章 现代语境中的革命乌托邦

第一节 革命与乌托邦	151
------------------	-----

一、从空想到科学	151
二、浪漫：左翼小说革命狂想的特质	158
三、“忧郁”：《上海屋檐下》的隐型意义	167
第二节 “革命”语境中的农民形象	177
一、“发现”农民	178
二、激情想象中的革命农民	183
第三节 当女性遭遇“革命”	190
一、女性革命和革命女性	190
二、当“革命”遭遇性爱	196
三、裂隙中的个人话语	201

第五章 余论：乌托邦在路上

第一节 革命、乡土乌托邦的延续	211
第二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反乌托邦	214

参考文献	220
-------------------	------------

后 记	240
------------------	------------

绪 论

择取“乌托邦”这一维度用以观照和探究民国时期文学的想象方式，是缘于对 20 世纪末乌托邦“终结论”浮现的困惑与质疑。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乌托邦“终结论”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声音。这是一个缺乏传奇与想象、梦想与信念的“贫困时代”，“由于神的缺席，那给世界的基础的地基隐匿了。……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没有地基来支撑的时代悬于深渊之中。”^①自 19 世纪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后，20 世纪福柯慨然宣称“人死了”，利奥塔德悲凉地向世界宣告“知识分子死了”，诸多声音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世界存在的中心秩序已颓然丧失，人类灵魂栖息的精神家园已沦为“乌有之乡”。乌托邦是走向“历史的终结”还是将以某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对此，不少学者持悲观主义态度。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人类已走向“乌托邦力量的穷竭”，它表现在“近代曾经从中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望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可以使自主性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②。继之，伽达默尔在总结后现代主义实质时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诗·语言·思》，张月等译，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7 页。

② [德]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薛华译，《哲学译丛》，1986 年第 4 期，第 63—69 页。

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①而苏珊·桑塔格的说法更为偏激，她断然认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②世纪末颓靡、消沉的隐郁气氛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一道沉浸于乌托邦“终结论”的感伤与绝望。

诚然，乌托邦走向终结的观点有充分的根据。古典乌托邦实现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由社会组织的幸福的神话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逐渐褪色，现代乌托邦运用科技合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梦想在随之滋生的不良后果前一一击破，乌托邦社会实践的失败更是沉重地打击人们的信心和期望。然而，这并不意味乌托邦应该消逝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乌托邦理想没有收到预期的历史效应，不意味着乌托邦观念本身的失败。如同人类任一思想体系本身总是存在着缺憾和不足，它需要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完善以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其实，乌托邦之所以拥有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使现实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和勇于改变就是它的题中之义，“乌托邦不是以对改变的可能性的慎重估计去面对现实，而是以改变的要求去与之相对”^③，它拒绝接受当前给可能性下的定义，也拒绝当前为它自己下的定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对乌托邦的观点。詹姆逊认为，虽然乌托邦在全球化的今天衰落了，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彻底地反乌托邦，它依然存在着，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发生作用。而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狂潮从另一侧面说明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的滋养。后现代主义需要一种完全

^① 转引自章国锋：《符号、意义与形而上学：伽达默尔谈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学》，1991年第2期，第273—282页。

^②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③ [英]克利杉·库玛：《新乌托邦主义》，转引自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读书》，1998年第12期，第62—68页。

不同的未来想象,作为一种形式,乌托邦不是对未来另一种社会形式的再现,而是一种出于迫切需要的想象,也就是说,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想象的是什么,而是作为一种激励和希望的想象本身。^①

乌托邦无论是否遭到现实考验而举步维艰,还是因为充满希望而令人着迷,它终究是一种人类历史前进的驱动力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冲动。乌托邦“终结论”的浮现引发我对这一命题进行回溯和反思的兴趣。乌托邦是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美的渴望和冲动,其话语构成与历史实践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为一种与人类思想相形相随的语言艺术,有关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想象应是其题中之义。当作家以个性的想象和理解,表达有关理想世界和个人形象的艺术创作时,融合着自身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和审视,更包含着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因此,不论就现实、未来两个时间向度上的关注,还是用以传达理念的想象和虚构方式,乌托邦与文学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点。作为一种人类古已有之的思想类型,乌托邦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文学的场域?进入文学后,乌托邦又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凸现自身精神特质并影响文本的生成?由于秉承思想资源与传统文化的差异,中西乌托邦的异同何在?在民国时期的小说范畴里,存在何种形式上、何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书写并反过来为我们观照乌托邦提供新的维度?对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需要对乌托邦、乌托邦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乌托邦书写等作深入而全面的考察,从而促成本书选题以及研究理路的形成。

由此,本书通过爬梳和归纳民国时期有关乌托邦思想特质的文学现象,探察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类型,进入民国时期小说文本后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及其想象方式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以期从文学的角度切入乌托邦功能和意义的研究。之所以以民国时期为语境展开言说,是由此规避传

^① 转引自林慧:《从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看后现代社会中的乌托邦意识》,《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第149—150页。

统文学史分期“现代”、“当代”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性质,从而力图以历史主义的精神客观、科学地考察乌托邦文学想象形式的特质与意义。本书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首先,在重新厘定“Utopia”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作为一种精神倾向,乌托邦与人的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作为文学想象的另类方式乌托邦具有的特殊叙事模式。“Utopia”一词潜藏着看似悖论的复杂意味,“美好”和“乌有”并存的双关义常为人忽略。而词义在跨语际旅行中发生的变异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严厉批判加剧人们的“误读”。乌托邦是“暂时被现存势力阻挡却有可能实现”的“趋向”或“热望”,是人类对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存在境遇的追求和向往,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表现。“世俗化”是中西乌托邦的共性特征,“乡”与“城”是它们各自寄寓理想社会结构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形态的文类,乌托邦文学业已形成特殊的叙述要素和结构。空间架构和时间流程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乌托邦大多设定在一个与世隔绝或远离现世的某一处地方,在时间上则另辟了一个新异的维度,使人们从现时横跨到自己所梦想的时间中。而克利杉·库玛有关“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一说,其立论的前提及对乌托邦概念的界定都存有相当的主观性。乌托邦不应当限定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而应着重考察其作为一个社会构成概念的内涵。中国的乌托邦与西方相比,虽说称谓有别、内容有异,但就其“寓意”或“内容”而言,仍是颇具人文主义理想色彩的文化想象。

作为20世纪初近代时期“向前看”的乌托邦叙事形态,政治乌托邦是现代乌托邦的前奏和萌芽,也是中国古典向现代乌托邦转型的重要表现形态。作为中国古典乌托邦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大同思想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得到了新的阐述与言说。对大同世界美丽远景的热情向往和注目于“人”的世俗生活的现代理念,使之突破与超越中西古典乌托邦固有的静止和僵持状态,并凭借想象显示的力量赋予现实以“新的力量”。

继之,近代知识分子借助小说放飞个人的奇思玄想,勾画出一幅幅政治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的未来蓝图。乌托邦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对实有社会的客观描述,而在于对理想世界的主观发挥。在有关未来民族国家政体“新中国”的文学想象中,寄寓着近代知识分子振兴中华、改造国体的宏伟理想和迫切期望。不过,由于太过峻切的救国热望,晚清乌托邦常常充溢着恢复“天朝上国”的昔日荣光,以及复仇雪恨、称霸全球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使小说的时间观呈现出一种回到“未来”的复杂形式。而由于无法自如地适应“新小说”体例的范式转换,科幻乌托邦具有某些不够成熟的表征,太过沉重的感时忧国精神和不合时宜的神魔意识削弱了乌托邦本应具有的批判精神。

现代时期主要呈现为“向后看”的乡土乌托邦与激情昂扬、“向前看”的革命乌托邦两种叙事形态。以京派作家为代表“向后看”的乡土乌托邦通过对已逝过去的追念与缅怀表达“重塑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乡土是他们用以寄寓漂泊灵魂、构建乌托邦“乌有之乡”的重要场所,“边城”、“桃园”、“果园城”等俨然构成一个有关家园的叙事谱系。乡土乌托邦之梦源于写作者的边缘意识以及由此所持的文化立场。可贵的是,在构筑乡土乌托邦如诗境界的同时,理性作为反乌托邦的力量潜在地规约并解构着这些美丽的“旧世界”。不论在沈从文纯净、幻美的“边城”乌托邦,还是在废名看似自我沉迷的“桃园”乌托邦里,作家都以清晰的笔墨书写着导致乡土乌托邦瓦解的种种“异质”因素。这些既远离现实又影射现实的田园世界,不仅以乌托邦的形式承载人类本能的幸福苛求、对内在压抑的升华以及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而且唤起人们足以摧毁恐惧、“具有合乎逻辑的、确实的纠正能力以及头脑敏锐之能力”的“希望”之力。而老舍以反乌托邦的手法从“他者”的视阈书写有关现代中国形象的小说《猫城记》,从另一侧面回应和补充现代京派乡土乌托邦的叙事形态。它集合讽刺、调侃、嬉戏、滑稽于一身,嫁接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写法,成

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另类”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体例。

社会主义革命乌托邦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的中国扎根、生长,以至于绵延甚久,有赖于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左翼作家对未来民族国家的热切想望。“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裹挟着“以暴制暴”意识形态的强劲势力,农民和女性,这两个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各种力量压迫的群体成为承载革命乌托邦文学想象的最佳对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农民一改往日落后、卑贱而麻木的国民形象,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大无私、敢作敢为的动人光彩。农民集体暴动和个体成长的文学叙事成为塑造革命神话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同时,革命为不安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现代女性提供了个性解放的历史契机。茅盾对革命女性的乌托邦想象富有复杂意味。孙舞阳、章秋柳等以新时代的圣女气质遮蔽妩媚、诱人的荡妇形象。叶紫小说《星》是一个有关女性革命的独特文本,其中塑造的女革命者梅春以生动而丰富的个性彰显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热烈的情爱面前,圣洁而崇高的“革命”遭到无情的挤兑,但正是这种叙事裂隙使小说得以传达永不为革命遮蔽的美丽人性。迥异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叙事惯有的革命乌托邦想象,夏衍的“灰色的、非英雄”的文本《上海屋檐下》蕴藉着浓郁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从隐性文本结构而言,它是关于中国革命及其知识分子的“忧郁”言说,彰显出夏衍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立场。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夏衍对该剧欲“演”还休、欲忘不得的缘由所在。

现代时期乡土、革命乌托邦在当代文学中的延伸与发展更有许多阐述的空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一种激进的文学理想模式进行,它是胜利者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历史“本质”的“重构”。不论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还是农村题材小说中,都洋溢着响彻天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愈演愈烈的乌托邦冲动终于伴随“文革”的到来走向极端。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乡土乌托邦再度成为